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1197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DOI: 10.65961/crcl-2026-0056

《西儒耳目資》u 字母甚、中、次三分考
——兼論明清西人注音文獻的複雜性質

尹　瑀

南京大學

提要

明清西人注音文獻音系的複雜性，在既有研究中未受充分重視。本文以《西儒耳目資》u 字母為中心展開個案研究，明確了甚 u[u]、中 ụ[ʉ] 及次 ủ[ɯ/ɿ] 的擬音方案，並論證其聽覺層級差異源於口腔共鳴腔的物理特性。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明此類文獻的複雜性質：既能為明清官話的音系構擬提供關鍵的語音細節，又會因“他者”視角而存在“強人就我”的記音偏誤，後者對於研究漢語國際教育史與中西文化交流史亦有重要價值。

關鍵詞

《西儒耳目資》音系，甚中次，語言演變，語言接觸

© 2026 尹瑀。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甚、中、次”是明末來華西人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在《西儒耳目資》（1626）中創製的一套語音分析術語，用以描述明末官話中那些無法用 a、e、i、o、u 羅馬字母記錄、卻為漢語母語者“自然知之”[1] 的語音區別，承載著非漢語母語者對明代官話音系的跨文化觀察視角。釐清這一術語的內涵，是準確解讀《西儒耳目資》音系、進而探求明代官話真實音值的關鍵。書中，i、a 字母未作相關區分，e、o 字母僅作甚、次二別，唯有 u 字母獨具甚、中、次三分。有鑒於此，u 字母成為探究“甚、中、次”具體含義最理想的突破口，向來備受學界關注。

目前已有不少學者對《西儒耳目資》u 字母的甚、中、次問題進行過探討，然而由於金尼閣對“甚、中、次”的描述較為模糊，學者們理解各異，而且研究時還須兼顧韻字的古音來源及歷史演變，導致各家擬音仍存較大分歧，例如羅常培（1930）將甚 u、中 ụ、次 ủ 分別擬作 [u][ɥ/ʮ][ɿ]、陸志韋（1947）擬作 [u][ʉ] 及“不定的 ï”、李新魁（1982）擬作 [ʊ][u][ɯ/ɿ]、曾曉渝（1995）擬作 [u][ʮ][ɿ]、蔣冀騁（2002）擬作 [ʊ][u][y]、孫宜志（2014）擬作 [ʊ][u][ɿ] 等等。

造成這樣的分歧，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研究視角的偏差：相關研究大多沿襲了傳統國人韻書的研究思路，將書中所記語言現象直接等同於明代漢語的實際情況，而未能充分考慮金尼閣的非漢語母語者身份，更未能將《西儒耳目資》置於語言接觸的框架下分析。因此，有必要全面考察《西儒耳目資》甚 u、中 ụ 和次 ủ 字母的分布情況，釐清相關概念，明確甚、中、次的判定標準，並重新審視西人注音文獻在明清官話研究中的用法及地位。

2. “甚 u”和“中 ụ”字母

本節討論主要涉及 u、ụ 和 iụ 三個韻母。現將《西儒耳目資》音系中它們的拼合關係表列如下：

表 1 《西儒耳目資》u、ụ、iụ 韻母拼合表

	u										iụ				
	清		濁		上		去		入		清	濁	上	去	入
	ū甚	ụ̄中	û甚	ụ̂中	ù甚	ụ̀中	ú甚	ụ́中	ŭ甚	ụ̆中	iụ̄	iụ̂	iụ̀	iụ́	iụ̆
百	逋				補		布								
魄	鋪		酺		普		鋪								

[1] 《西儒耳目資 · 譯引首譜 · 列音韻譜問答》葉四十八：“中華自幼學習，自然知之，旅人敝土未知，勉而學之，故勉而補之。”

麥			模		母		暮								
弗	夫		符		甫		附								
物			無		武		務								
德	都				覩		度								
忒	琸		徒		土		吐								
搦			奴		弩		怒					衄	女	女	
勒			盧		魯		路					閭	旅	慮	律
則	租				阻		胙		崒		疽		沮	聚	
測	麤		稷		楚		措		浚		趨	徐	取	娶	焮
色	蘇				數		訴			恤	須	徐	胥	絮	恤
者		諸			詛	主	助	著		术					
搽	初	樞	鋤	除	澍	杵	憷	處		黜					
石		書		殊		暑		恕		術					
日				儒		汝		茹		入					
格	狐				古		顧				居		舉	據	茁
克	枯				苦		庫				墟	渠	齲	去	屈
黑	呼		胡		虎		互				虛		許	噓	殟
額			吾		伍		誤								
∅	烏		吾		午		誤				迂	魚	語	御	域

先看 iụ 複韻母。就中古音的來源而言，這批字主要與古遇合三、臻合三入術物、通合三入屋燭、曾合三入職、梗合四入錫韻對應。現代普通話音系基本讀入 [y] 韻。值得關注的是，“中 ụ”字母的設立，是金尼閣的創見，並未出現於此前的西人注音文獻中。這一突破前人框架的舉動，顯示出金尼閣對於“中 ụ”字母的獨立極具信心。再結合金尼閣的母語法語中，u 字母表示 [y] 音，再次暗示 iụ 韻母的音值，當與 [y] 音非常接近。

不過，再綜合以下證據來看，《西儒耳目資》中 [y] 音位尚未形成。首先，金尼閣曾言：“如衣 i 字為元母之三，其號自定，其音曰衣 i，加以元母之午 u，則生夫魚 iu。”可見，在其語感中，“魚”音仍是一個由 i 與 u 拼合而成的複合元音，而非單元音。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就漢語共同語音系的發展進程而言，*iu>y 音變此時尚未完成。明清以降，古遇攝合口三等字呈現出三種歸併狀態：歸入魚模、獨立成韻或混同西微。前輩時賢多以“獨立成韻”（如甯繼福 1985: 225；唐作藩 1991；萬獻初 2011 等）或“混同西微”（如陸志韋 1988: 22；董建交 2021: 187–188 等）作為 [y] 音形成的關鍵節點，並對音變完成的代表性文獻產生了爭議，具體存在《洪武正韻》（1375）、《韻略易通》（1442）、《韻略匯通》（1642）、《五方元音》（1654）等不同說法，文獻跨度長達 300 年。本文認為，[y] 音形成後，獨立成韻或混同西微均有可能，這取決於韻書作者的語感和審音標準。相比之下，觀察古知三章組聲母與遇攝合口三等字的拼合狀態，才是判斷 [y] 音是否完全形成的可靠依據。因為無論將古知三

章組遇攝合口三等韻擬作 tʂiu 類還是 tʃiu 類讀音（即是否認同 tʂ 類聲母可與細音韻母相拼），在解釋其如何演變為現代普通話 tʂu 類讀音的過程中，都會面臨與 y 韻母拼合的矛盾。具體來說，若擬作 tʂiu 類韻母，*tʂiu>tʂy>tʂu 音變中須經歷的 *y>u 環節，缺乏合理的音變條件；若擬作 tʃiu 類，則會直接發生 *tʃiu>tʂu 音變，並不經歷 *y 韻母階段。由此觀之，如果明清官話文獻音系中，古遇攝合口三等字呈現出系統性分化：知三章組字歸入 [u] 韻，其餘字（唇音除外）獨立成韻或混同西微，即可證明其時 [y] 音已徹底形成。而目前所見最早形成這一格局的，為清代樊騰鳳（1601–1664）所作的《五方元音》音系，書中上述兩類字分入虎韻和地韻。[2]

從音理上觀察，*iu>y 在語音上應該是漸變的，發音時逆同化作用使 [u] 的圓唇動作提前發生，同時 [u] 的舌位從後部逐漸移向前部，最終融合成一個兼具 [i] 舌位和 [u] 唇形的前高圓唇元音 [y]。整個演化的過程可用公式表示為：*iu>iʉ>y。那麼，《西儒耳目資》中的 iu̩ 韻母，自然表示的是 *iu>y 過渡階段的音值，即 [iʉ] 音。由此推測，“中 u̩”字母描寫的就是 [ʉ] 音。

再看 u、u̩ 單韻母。就擬音而言，韻母 u 主要與古遇合一、遇合三、臻合三入物韻對應，這些字在現代普通話音系中基本讀成 [u] 音，古今一致，可直接擬作 [u] 音；韻母 u̩ 則可依據上文對“中 u̩”字母的分析，直接擬為 [ʉ] 音。相比之下，更為複雜且需要深入探討的，是 u 與 u̩ 兩韻母之間的關係。

觀察表 1 可知，“中 u̩”韻母主要出現於者、搥、石、日聲母之後，而同一聲母環境下的“甚 u”韻母用例則頗為有限，並且這些韻字在現代普通話音系中基本讀為 [u] 音。基於上述特徵，有些學者主張“中 u̩”韻母並非獨立音位，而是“甚 u”在捲舌聲母後的音位變體，或某種方言中的特定讀法，雖然依照金尼閣的分法擬成“甚 [ʊ] 中 [u]”形式，但不認可兩者是真正的音位對立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金尼閣母語為法語。法語音系中存在 [u][y] 兩種高圓唇元音的對立，這種語言經驗可能使其對於圓唇元音舌位前後的細微差異更加敏感。從語音學角

---

2 需要說明的是，y 音的形成與撮口呼的獨立關係密切。目前所知最早分立“撮口呼”的文獻是明末李登（1524–1609）的《書文音義便考私編》（1587），收錄在明末梅膺祚（生卒年不详）《字彙》（1615）中的〈韻法直圖〉〈韻法橫圖〉亦分此呼，時間上明顯早於本文推論的 [y] 音完全形成的《五方元音》時期。不過，*iu>y 音變是一個漸變的語音過程，並且傳統韻書主要反映音類的分合，難以呈現精確的音值，因此這只能說明作者意識到該類介音已非 *iu 音，在聽感上有別於傳統的開口、合口，但實際音值未必對應現代語音學意義上的 [y]。這一判斷可從朝鮮諺文對音文獻中得到印證。金基石（2007: 60）系統梳理了 15–18 世紀朝鮮文獻中的諺文對音，指出“從朝鮮文獻的對音上看，還沒有證據表明《韻略易通》時期即 15 世紀 y 韻化已經完成，陸志韋先生推論《五方元音》時期即 17 世紀似乎更有道理，此前應為 iu 向 y 演變的過渡期。”這一結論與本文的觀察正相一致。

度觀察，後高圓唇元音 [u] 因唇腔向前延伸，聲腔較長，具有較低的第二共振峰，而央高圓唇元音 [ʉ] 則因舌面收緊隆起的最高點的位置前移，共振頻率改變，第二共振峰相對較高。兩者之間的音色差異，對缺乏前、後高圓唇元音對立的漢語母語者而言未必容易察覺，但對於習慣 [u][y] 對立的法語母語者而言，則較可能在聽覺層面形成可辨的差異。尤其是在者、搽聲母之後，“甚 u[u]”與“中 ụ[ʉ]”構成嚴格的最小對立對，更說明金尼閣的區別記錄並非依附於聲母的條件變體，而是建立在語音感知基礎之上的相對穩定記錄。

更重要的是，根據本文的觀察，既有研究多側重“甚 u”“中 ụ”的聯繫，沒有充分關注到兩者的不同。在者、搽聲母之後，這兩組韻母不僅構成了最小對立對，而且所攝韻字的古音來源亦有差異：“甚 u”韻字主要源於古莊組三等字，而“中 ụ”韻字則主要來自古知三章組字。若進一步結合石、日聲母中“中 ụ”韻字的古音來源，可以明確，“甚 u”與“中 ụ”之間的對立，本質上反映的是古遇攝合口三等字中莊組與知章日組的系統性分化。

這一對立格局的形成，與知三章組（包括日母，下同）遇攝合口三等字的音變過程密切相關。該類字經歷了聲母捲舌化與韻母前化的協同變化：聲母首先發生捲舌化（*tʃi->tʂ- 或 *tʂi->tʂ-），導致原有的 i 介音消失；失去前化條件後，韻腹 u 的前移進程中止，穩定在 [ʉ] 音區。隨著音系結構的重新平衡，[ʉ] 逐漸併入 [u]。其演變路徑可歸納為 *tʃiu>tʃiʉ>tʂʉ>tʂu（或 *tʂiu>tʂiʉ>tʂʉ>tʂu）。《西儒耳目資》記錄的正是處於過渡階段的 *tʂʉ 音。與同時期國人韻書的失載相比，金尼閣的記錄不僅保存了當時官話的真實語音狀態，更為瞭解完整的音變過程提供了關鍵細節，成為記錄這一現象的珍貴文獻。

類似的音類對立現象亦見於今河南西部的部分方言，如洛陽的欒川、偃師，鄭州下轄的鞏義、登封，以及黃河以北的濟源、新鄉、浚縣等（段亞廣 2021）。在這些方言中，遇攝三等字同樣呈現出聲母相同、莊組韻母同於一等（u 音）、知章組韻母自成一類（ʮ 音）的格局。董建交（2021: 191）認為，《西儒耳目資》音系與此方言類型一致。然而，本文認為二者未必存在直接的歷史聯繫。這種相似更可能屬於平行發展的結果，關鍵差異在於特殊韻母的分布範圍：河南西部方言的 ʮ 韻僅限於遇攝的知章組，而《西儒耳目資》中另有“iụ”韻，所轄韻字範圍更廣，涵蓋遇合三的精組、見系等。段亞廣（2021）已經指出，河南方言的這一現象，是舌尖作用突出影響下形成的一種區域性、自源性演變，音變路徑為 *tʃiu>tʃʮ>tʂʮ，而其他地區則遵循常規路徑 *tʃiu>tʂu。《西儒耳目資》所描寫的，正是後一路徑中的 *tʂʉ 音。

3. “次 u̇”字母

《西儒耳目資》中，“次 u̇”字母的出現具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出現在則 ç[ts]、测 ç‘[ts^h]、色 s[s] 聲母後。並且，它的中古音來源非常集中，主要與《切韻》（601）

音系的古精莊組止攝開口三等字對應，如：咨脂、慈之、紫紙、四至。這些字，《中原音韻》（1324/1341）音系基本歸入支思韻 [i]，現代普通話音系基本讀為 [ɿ] 音。

關於“次 u̇”字母所描寫的音值，學界主要觀點如下：一是官話 [ɿ] 音，如曾曉渝（1995）、王松木（2011）、孫宜志（2014）等；二是山西方言 [ɯ] 音，如陸志韋（1947）、李新魁（1982）；三是官話 [ɯ] 音或 [ɥ] 音，如王弘治（2012）、張民權（2013）等。三種觀點皆有所據，然仍有未盡之處。第一種觀點並未解釋金尼閣為何選擇 u 字母記錄 [ɿ] 音的核心問題；第二種觀點已受到曾曉渝（1995: 34）的質疑，“山西方言中讀 [ɯ] 韻的字與金氏‘u̇ 次’韻字對不上號”；第三種觀點則需進一步結合漢語史的其他材料，論證漢語共同語的 iɔɿ 音變曾經歷過 [ɯ] 或 [ɥ] 音階段。更關鍵的是，上述三種觀點均未考慮到《西儒耳目資》音系的語言接觸屬性。確定西人模仿之音和國人認可之音是否一致，是研究這類文獻必須審慎對待的重要問題。

確定書中所述“次 u̇”字母的具體音值並不困難。稍晚成書的萬濟國（Francisco Varo，又譯弗朗西斯科 · 瓦羅，1627–1687）《華語官話語法》（1703）可為此提供重要線索。作為“金尼閣系統的翻版”（柯蔚南 2003: F13），[3] 該書對很多字母的發音作了詳盡細緻的描述。萬濟國雖將《西儒耳目資》的中 u̯、次 u̇ 字母合併記作次 u̇ 字母，但其中“以 ç 開頭”的次 u̇ 字母（即與聲母 çh[ts]、çh꞉[tsʰ]、ç[s] 拼合的次 u̇ 字母），實際上對應著《西儒耳目資》中的次 u̇ 字母。對此，萬濟國（瓦羅 2003: 26–27）的發音描述有二：（一）“以‘ç’開頭的詞或音節，如‘çhu̇’和‘çu̇’及其所有聲調，即使帶有圓點，也不在閉口圓唇之列…… ‘ç’或‘z’的自然發音是在齒內完成的，這兩個音與閉口音不能相容，原因就在這裏。”（二）“那些以‘ç’或‘çh’起首的詞，雖然也屬此列，發音卻不同：嘴唇要開，露出牙齒，舌頭觸齒時用一些力，使得發聲時帶上‘嗞嗞’聲…… ‘z’或‘ç’的自然發音就是如此：嘴呈開狀，舌頭觸碰牙齒，這種情況下就不可能再閉攏雙唇。以這種方式發音的詞，如‘雌’（çh꞉ṳ̆）、‘慈’（çh꞉ṳ̂）、‘刺’（çh꞉ṳ́）。”其中，“不在閉口圓唇之列”“不可能再閉攏雙唇”等表述，則明確指向韻母的發音狀態。由此可見，明清西人注音文獻中描繪的 u̇ 字母，是一個似 u 非 u 的不圓唇元音。“不圓唇元音”，首先排除了 [ɥ] 音的可能。而對於漢語中頗具特色的舌尖元音，金尼閣明顯存在感知困難。以 [ɿ] 音為例，他雖能辨出其與 [i] 音有別，但仍在〈譯引首譜 · 列音韻譜問答〉葉五十四中表示“忒細易亂，故從便尋之用。一甚之中俱包之，未敢細別，余心未安故耳”，勉強將 [ɿ] 韻字歸入了“元母之三衣 i”[i] 韻中。[ɿ] 音的感知情況大抵也是如此，它只能被金尼閣歸入一個似 u 非

[3] 經比較，萬濟國、金尼閣方案的字母區別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送氣符號的位置，二是萬濟國方案中新出現 çh、çh꞉、ng 三種字母組合，這主要是為了適合西班牙語讀者的需要。兩者整體呈現出“大同小異”的格局。這絕非偶然，因為萬濟國書中多次提及耶穌會的羅馬字注音方式，明顯借鑒過耶穌會的成功經驗。

u 的舌面元音。不僅如此，對 [ɿ] 的辨認困難，直至清代仍是來華西人學習漢語的普遍難題，例如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在《語言自邇集》（1886）中如此描述 [ɿ] 音：“介於 bit 中的 i 和 shut 中的 u 之間的音……我們沒有合適的元音表示它”（威妥瑪 2002: 26），依然是從舌面元音的角度去感知。綜上所述，《西儒耳目資》中的 ù 字母實際是對舌尖元音 [ɿ] 的“舌面元音化”描寫，最有可能的只有 [ɯ] 音。如此構擬，也同樣符合金尼閣〈譯引首譜 · 列音韻譜問答〉葉五十五“開唇而出者為甚，略閉唇而出者為次”的描述。

不過，西人記錄之 [ɯ] 音，是否真實反映了當時官話的實際讀音，仍有待商榷。從漢語語音史的角度觀察，這類字從中古到現代經歷了系統的舌尖化音變。朱曉農（2004）已指出，該音變通常經由 *i>ɿ 或 *i>i$_{ɹ}$>ɿ 實現。趙日新（2007）也提到，*i>ɿ 是廣見於現代漢語北部和中部的一種音變現象。綜合音理推演和方言證據來看，漢語史上的 *i>ɿ 音變，沒有經歷過 [ɯ] 音的階段。儘管如此，近年來，仍有學者嘗試結合歷史文獻，將《西儒耳目資》記錄的特殊音值納入官話止開三精莊組字的音變鏈條中。然而若仔細檢視其立論依據，可發現這些材料大致可歸為兩類：一是方言接觸後的官話文獻，二是語言接觸後的域外語料。下文分而述之。

一、方言接觸後的官話文獻，主要涉及《韻補》（成書於 1152 年之前）《詩集傳》（1186）兩種受閩語影響的國人文獻。

（一）南宋吳棫（？–1153/1154）所撰《韻補》，博考古音，開宋代古音學之先河。書中數次提及“俗讀”中存在古止開三精莊組字讀如魚虞韻的語音現象，如：

> [茲] 子之切，此也。子聲本如濟水之濟，以濟翻茲，方得本音。思息茲切，詞似茲切，皆當用此音以翻，今讀訛。又菑本側持切，聲當近之；慈本疾之切，聲當近齊。今俗讀此二音幾與魚虞等韻相叶，其失之甚矣。
>
> [資] 如今讀，叶魚韻，貨也。……古資雌疵思詞一類多與今魚虞等韻叶用。
>
> [士] 事也，今與止韻叶用，古有一音，如今世俗所讀，而與“舉武”為韻。
>
> [事] 事本仕吏切，古有一音，如今世俗所讀，與御遇相叶。

邵榮芬（1995）已經注意到這一現象，指出這是受到了吳棫祖籍福建建甌方言的影響。此後學者多從此說。然而，張民權（2005: 109–111）考宋儒文集所記人事，指出吳棫本人不屬閩人，實為皖地舒州（今安徽安慶）人，並進一步主張該現象為“早期官話音的表現”（張民權 2013: 69）。閩音影響說的立論基礎似乎受到了衝擊。

需要指出的是，《韻補》中的這一特殊現象，僅出現在“俗讀”之中。如何理解“俗讀”，成為解題關鍵。張民權（2013）認為，吳棫所言“俗讀”是相對於讀書音而言

的“白讀”，即口語中流行的“通語”音。然而，這一觀點恐難成立。同為南宋文人的孫奕（1126–？）在《示兒編》（1205）中就將“俗讀”放入卷十八“聲訛”之中。“俗讀”一詞，應指在某一地區口語中實際流行的讀音。《韻補》成書之時，吳棫正在泉州為官，[4] 故書中所謂“俗讀”，更適宜理解成在泉州地區通行的官話音。止開三精莊組字與遇合三合流的特點，宋代閩南泉州文士詩詞文用韻中已見（劉曉南 1999: 179），今泉州方言仍能尋得蹤跡（林連通主編 1993: 160）。由此可見，將此現象歸為一種帶有泉州方言特色的官話讀法，是可以成立的。

（二）宋儒朱熹（1130–1200）的《詩集傳》（1186），是宋代《詩經》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書中所用叶音及相關語料，多以通語、方音、音理、偏旁類推、文獻舊音等為據，是研究宋代時音的重要資料。據劉曉南（2023: 520）統計，該書止攝開口三等精莊組字改叶遇攝的現象，只涉及“子$_{叶茲五反}$”“子$_{叶茲古反}$”“士$_{叶音所}$”3 次叶音。整體而言，這類叶音用例並不顯著。朱熹出生於福建尤溪，成長於建州，慶元二年（1196）後主要居於武夷山和建陽雲谷，壽終於建陽考亭，可以說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閩語地區生活。止開三精莊組字與遇合三通押，是宋代閩音的一大特點，遍布除汀州外的七閩大地（劉曉南 1999: 179）。因此學界基本認可這一叶音現象是閩方言的折射，劉曉南（2001）、曾南逸（2015）等學者均持此說。

二、語言接觸後的域外語料，主要涉及中古以來與漢語深度接觸過的越南語、蒙古語、琉球語、朝鮮語。此類材料在性質上與《西儒耳目資》頗為相似，均屬於非漢語母語者使用表音文字所作的記錄，因此值得特別重視。

（一）越南漢越語。作為一種對應中唐以後漢語共同語音系的域外漢字音（王力 1991: 533），漢越語中止攝開口三等字基本讀為 [i] 音，但精莊組字卻與遇攝魚韻字的讀音相同，讀作 [ɯ] 音，如：資 [tɯ^{1}]、詞 [tɯ^{2}]、四 [tɯ^{5}] 等（阮廷賢 2012: 204, 231–232）。王力（1991: 501）、阮廷賢（2012）等學者因該現象不涉及知、章組字，而判定其與漢語無關，屬於漢越語自身的演變。但是，聯繫《西儒耳目資》中止開三精莊組字歸入“次 ù”字母、知章組字歸入 i 字母的描寫來看，兩者的記錄具有高度相似性。而《西儒耳目資》確為記述明代官話的重要語音文獻。基於這一聯繫，我們認為上述現象同樣與漢語官話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繫。

（二）元代八思巴字文獻。作為元代八思巴字漢語的官方譯寫規範，《蒙古字韻》（1269–1292）全面系統地反映了此時漢語共同語的語音面貌，是此類文獻中最重要的一種。書中古止開三精莊組字用 hi 字母轉寫。鄭張尚芳（1998: 175）指出“-hi 當是近於 [i]

4 紹興十五年（1145）十一月二十日，吳棫以左朝奉郎的身份通判泉州，並在此整理著述，直到紹興二十二年（1152）才離去。《韻補》等書正是成於此時（張民權 2005: 113–116）。

的 [ɯ]，那就是 [ɨ]”“這個很接近 [ɿ] 的 [ɨ] 也應當就是拼‘精照’組聲母的 -hi，此時也只是有點接近 [ɿ]，但還不是……應當也是 ɯ、ɨ、ɘ 類的音。”由此可見，在元代蒙古人的聽感中，官話古止開三精莊組字的讀音同樣被認為是一個與 [ɯ] 接近的音值。

（三）明代琉漢對音文獻。自明洪武五年（1372）中琉關係日趨密切以來，多種琉漢對音資料應運而生。這些資料均由朝廷直隸衙門官員編纂，語言素材來自實地實錄，並最終上呈御覽，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和音韻學研究價值。丁鋒（1995: 108）聯繫《琉球館譯語》（約 1469）、《使琉球錄》（陳錄 1535、蕭錄 1579）等資料，指出“司思茲子孜自資”等止攝精組字與“祖足速俗宿”等模韻字、通攝入聲字都對譯著琉球語中的 tsu、dzu、su 等音節，並解釋為“混合對音”的結果，因為琉球語中這些音節的韻母先後經歷了 [u][ɯ] 階段，模韻、通攝入聲字對應的是 [u] 音階段，而止攝精組字則對應的是 [ɯ] 音階段。

（四）明代漢朝對音文獻。為了培養通曉漢語官話的人才，朝鮮王朝刊行了一系列漢朝對音文獻，尤以學者崔世珍（1468–1542）所編《四聲通解》（1517）最為突出。該書採用諺文系統記錄了“正音”“俗音”“今俗音”三種官話音系，分別對應於《洪武正韻》反切音、15 世紀時音（申叔舟記）、16 世紀時音（崔世珍記）。古止開三精莊組字，“正音”系統中記作“ᅳ”韻母，“俗音”系統中記作“ᅳᅀ”韻母，“正俗音”系統雖未直接著錄，但崔世珍在《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刊行於 1517 年之前）中明確認可了此類字的“ᅳᅀ”音讀法。[5] 從語音結構上看，“ᅳᅀ”可分析為核心元音“ᅳ [ɯ]”（擬音據李得春 1990）加上表示舌面元音舌尖化的“ᅀ”符號（李得春 1997）構成。可以推知，明代朝鮮學者亦將這批字的主要元音歸為 [ɯ] 音。

以上四種材料的標音儘管存在記錄時間與記錄者母語背景的差異，但對於止開三精莊組字主要元音的語音感知高度一致，均指向 [ɯ] 音。這指向兩種可能：一是該類字的官話讀音就是 [ɯ] 音，二是 [ɯ] 是記錄者從其母語中選擇的、最接近官話讀音的一個音位。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國學界普遍採用的舌尖元音符號 [ɿ][ʅ]，是由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借用瑞典方言字母而成。而在寬式音標中，他其實並未嚴格區分 [ɿ][ʅ][ɯ] 音，而是統一借用俄文字母 ы 記錄。這表明，在非漢語母語者的語感中，[ɯ][ɿ] 音值相近，以 [ɯ] 對譯 [ɿ] 是一種普遍接受的音位層面的近似處理，而非嚴格音值描寫。故而本文傾向於後一種解釋，認為這是以源語言中已有的音位近似模擬官話中發音特殊的舌尖元音。

5　《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九 支紙寘三韻內齒音諸字”條：“今案，齒音諸字，若從《通考》加ᅀ為字，則恐初學難於作音，古今之翻譯皆去ᅀ聲。而又恐其直從去ᅀ之聲，則必不合於時音。今書正音加ᅀ字於右，庶使學者必從正音用ᅀ作聲，然後可合於時音矣。”

從漢語語音史的角度觀察，舌尖元音 [ɿ]（即“資思韻”）至遲在晚唐五代時期已經形成。王力（2010: 291–292）、麥耘（2004）指出朱翱反切中已經出現“齒頭字切齒頭字”的明顯傾向，孫伯君（2009）也通過遼代契丹小字的使用情況進一步證實此時漢語共同語中 [ɿ] 音的存在。這一時間節點恰好與上文提及的越南漢越語的借入時代相近，可見漢越語的 [ɯ] 音記法，正是對漢語共同語 [ɿ] 音形成階段的直接感知記錄。此後 [ɿ] 音在漢語共同語音系中一直保留至今，元代八思巴字文獻、明代琉漢對音文獻、漢朝對音文獻中反復出現的 [ɯ] 類標音，實為不同時代、不同國籍的記錄者在各自母語中面對 [ɿ] 音所作的獨立感知選擇。因此，這些域外對音文獻的時代跨度雖然較大，卻共同指向了漢語共同語中長期穩定存在的 [ɿ] 音。

舌尖元音屬於標記性很強的元音，在印歐語言中較少出現。即使是在現代教學條件下，舌尖元音也是外國學生普遍感到困難的音素，是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中的重點和難點。那麼，對於生活在數百年前、全靠自悟的外族人而言，舌尖不圓唇元音 [ɿ] 的習得難度，只增不減。由於其母語中缺乏專用於舌尖元音的符號，他們只能以自己熟悉的語音系統模擬漢語發音，追求整體聽感的相似，難以實現音值的精確還原。而 [ɯ] 作為後高不圓唇元音，發音時舌身後縮、嘴角展開，易引起舌尖上抬，從而產生近似 [ɿ] 的音色（宋欣橋 2019: 52）。在缺乏精準標記手段的情況下，以 [ɯ] 對應 [ɿ] 成為了最可行的折中方案。時至今日，包括日本、韓國在內的不少國家的漢語初學者依然如此，他們會不自覺地將普通話的 [ɿ] 韻讀作 [ɯ] 音（曾南逸 2015；玄貞姬 2018）。

同樣從記錄者感知差異的視角出發，沈鍾偉（2022）提出過另一種可能性：根據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的數值，舌尖元音處於元音空間中的央高元音位置，因而可能存在普遍性的實際發音（舌尖元音）和聽覺感知（舌面央高元音）的區別。舌尖元音發音部位靠前而第二共振峰數值偏低的現象確實特殊，卻可以從發音生理機制中找到合理解釋。鮑懷翹（1984）通過比較 X 光發音照片，指出舌尖元音在舌面後——軟齶位置還有一個次收緊點，這個位置的前後直接影響了第二共振峰的高度，為上述現象提供了生理層面的說明。凌鋒（2011）則從另一個角度補充闡釋，強調對於比 [i] 更靠前的元音，第二共振峰與元音前後的傳統對應關係不再成立，轉而呈現元音越前、第二共振峰越低的關係。最後，若依沈鍾偉所述，舌尖元音的實際發音與聽覺感知之間存在如此普遍性的顯著區別，則很容易引發一場“聽者啓動”的語音演變，然而迄今並未觀測到此類音變的發生。綜上所述，將這種由母語背景差異造成的特殊聽感，推廣為一種普遍的語音感知現象，其立論基礎可能並不穩固。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近代以來官話中止開三精莊組字並未經歷過 [ɯ] 音階段。在金尼閣等明清來華西人的語感中，舌尖元音 [ɿ] 是被感知成了舌面後高不圓唇元音 [ɯ]。換句話說，《西儒耳目資》中的“次 ú”字母，記錄的本是漢語中的 [ɿ] 音位，但在實際認知過程中，金尼閣受母語負遷移的影響將其感知成 [ɯ] 音值，由此形成系

統性的“偏誤”。有鑒於此，根據研究目的的不同，《西儒耳目資》中的“次 u̇”字母應該看作不同的音值：當研究漢語語音史時，“次 u̇”字母應擬作 [ɿ] 音，而當研究金尼閣等明清來華西人所習得的“中介語”[6] 時，“次 u̇”字母應看作 [ɯ] 音。

4. 甚、中、次的分立標準

上文對《西儒耳目資》中甚 u、中 ụ、次 u̇ 三個字母所代表的音值進行了詳細考察與分析，結論指出：甚 u 宜擬 [u] 音，中 ụ 宜擬 [ʉ] 音，次 u̇ 宜視情況分擬 [ɯ] 或 [ɿ] 音。本節將基於上述考辨事實，進一步探討“甚、中、次”術語的語音性質。

對於甚、中、次的分別，金尼閣在〈譯引首譜 · 列音韻譜問答〉中多次闡述，具體如下：一、甚者，自鳴字之完聲也。次者，自鳴字之半聲也；二、中者，甚於次，次於甚之謂也；三、開唇而出者為甚，略閉唇而出者為次，是甚次者，開閉之別名也。然而，金尼閣的這番解釋，始終沒有解決國人對“甚、中、次”概念的困惑。《四庫全書總目》（1789）中“所謂甚次，即中國之輕重等子”的理解，顯然存在誤會。前輩時賢則試圖借助現代語音學概念加以界定，也始終未能得出一致的結論。

之所以出現此類解釋困境，一方面自然是與學者們的擬音分歧相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金尼閣所言的“開閉”概念是建立在自身語音認知基礎上，具有一定模糊性，與現代語音學定義並不完全等同。有鑒於此，要探求其本意，自然需要回歸到金尼閣的真實發音上，細緻分析甚 [u]、中 [ʉ]、次 [ɯ] 的發音方式。元音的音色是由聲腔的共振決定的，而口腔作為聲腔中最為靈活多變的部分，任何細微的變化都會對元音音色產生影響。發甚音 [u] 時，舌面後部隆起，圓唇又延長了有效聲腔長度，口腔共鳴腔最大，第二共振峰通常偏低，聽感較為渾厚；發次音 [ɯ] 時，舌身後縮、舌根抬高，同時嘴角向兩側展開，極大壓縮了口腔內部的共鳴空間，因而共鳴腔最為狹小，第二共振峰偏高，聽感較為尖銳。而金尼閣特意增設的中音 [ʉ]，舌面中部隆起，亦帶有圓唇延長聲腔的特徵，聲腔長度不及甚音 [u]，但口腔寬度大於次音 [ɯ]，共鳴腔大小適中，聽感上既不同於 [u] 的渾厚，又未完全呈現 [ɯ] 的尖銳，從而形成介於二者之間的中介性質。甚、中、次的感知，正是金尼閣依據歷史聽感經驗對元音音色差異的主觀歸納。這也啓發我們，在解讀明清時期西人注音文獻時，不宜機械套用舌位高低、前後等現代語音學術語，而應回歸其實際所記音值，結合發音機制和歷史語境進行綜合推斷。

---

[6] 中介語是指學習外語的人在學習過程中對於目的語規律所作的不正確的歸納與推論而產生的一個語言系統，這個語言系統既不同於學習者的母語，又區別於他所學的目的語，在語音、詞彙、語法、文化等方面均有表現（魯健驥 1984）。

“甚、中、次”之中，“中”音最為特殊。它並非承襲自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的甚、次二分方案，而是由金尼閣獨創並專用於 u 字母的一種類別。從古音來源看，金尼閣此舉實質上分離了 u 字母下的止攝字與遇攝字，將利瑪竇方案“次 ù”下非止攝字悉數劃入“中 ụ”，只留止攝字在“次 ù”中。究其原因，除前述的語音因素外，我們認為，傳統音韻學的啓發同樣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外部動因。與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利瑪竇等稍早來華西人相比，金尼閣對官話語音的研究，顯然更加深入。他不再局限於共時平面的現實語音，而已經深入到中國傳統音韻學的範疇，不僅廣泛涉獵《洪武正韻》《古今韻會小補》（1606）等韻書，而且還進行了中西語音學概念的融合和對比，《西儒耳目資》也是其與王徵、呂維祺、韓雲等中國文人互相質證、交流音學思想後出版的音韻學著作。書中，金尼閣作〈三韻兌考〉比較《西儒耳目資》《洪武正韻》等書的韻母系統，又作〈等韻三十六母兌考〉用圖表的形式比較《西儒耳目資》聲母系統與三十六字母，並在〈列音韻譜問答〉中詳細描述了“五十字父”和“三十六字母”的對應關係。因此，將 u 字母從甚、次兩分改為甚、中、次三分，對韻字不同古音來源的清晰認知，或許是金尼閣堅定態度的重要來源。

不過，這一做法，並沒有得到明清來華西人的普遍認可，其後的耶穌會士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 1592–1677）《無罪獲勝》（1671）、多明我會士萬濟國《華語官話語法》等都選擇了利瑪竇的兩分法，沒有使用獨立“中 ụ”符號。這背後除了中 [ʉ]、次 [ɯ] 音值相近等語音因素外，還有以下三種現實因素的考量：一、作為西人內部“一種規範的方法”，[7] 利瑪竇方案只作甚、次兩分，金尼閣方案只是在此基礎上的改進和擴充，影響力相對有限；二、對於明清來華西人而言，最迫切的需求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掌握官話，以實現與中國文人、百姓的基本交流，而不是從事精細的語言學研究。因此，學習的實用性往往優先於記音的精確性。利瑪竇的甚、次兩分法，已經可以實現基本的口語交流需要，其微小的“不準確性”尚在可接受的範圍內。相較而言，金尼閣的甚、中、次三分法雖更為精確，甚至達到了“賞知音”的水準，卻要求使用者多記憶一個特殊符號和一條注音規則，無形中增加了學習難度；三、對於書寫印刷而言，金尼閣方案需要增加一個特殊的中 ụ 符號，刻版工序更為繁雜，增加了製作成本，並需要耗費更多工時。

---

7 《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利瑪竇 2014: 233–234）：“為此神父們創立了一種方法，發明了五種標音符號和標注氣息的符號，用這種方法可以把所有漢字的發音都用拉丁字母寫出來，成為一種規範的方法。利瑪竇神父叮囑說，從此以後大家都要遵循這種方法，不得隨意書寫，以免造成像現在這樣的混亂。”

5. 結語

字母 u 的甚、中、次三分現象，是《西儒耳目資》研究中一個頗有代表性的切入點。這一問題看似屬於術語範疇，實則牽涉到了語言演變和語言接觸兩個重要層面：“中 u̯”的獨立，揭示了漢語共同語 *iu>y 語音演變的關鍵細節；而“次 ú”的存在，則體現了非漢語母語者學習 [ɥ] 音時的語音偏誤現象。見微知著，我們得以對明清西人注音文獻的研究形成更為系統的認識，初步結論如下：

其一，明清西人的官話語音描述，主要源於自身的認知與學習過程，因而具有一定的主觀色彩，所用概念未必能與今日語音學術語直接對應。想要準確理解這些特殊的分合現象，我們應秉持客觀審慎的態度，既不輕疑，亦不盲信，回歸到西人學習官話的具體歷史情境中，細緻辨析這些字在當時的實際語音，仔細揣摩明清西人的語音感受，如此方能在古今與中西的交匯中，努力接近歷史的真實。

其二，對於漢語語音史研究而言，每一種材料都存在一定的價值和局限。明清西人注音文獻也是如此。該類文獻的複雜性質，一方面在於它是漢語語音史的珍貴記錄，能為官話的音類分立和音系構擬提供最直接的信息；另一方面又因記錄者的母語干擾而帶有系統性偏誤，顯現出一些“他者”視角下的“強人就我”現象。因此，在明清官話的研究中，各類材料不可偏廢，我們既要鑽研國人留下的韻書、韻圖、詩文押韻及各類音義文獻等，也要琢磨外國人筆下的羅馬字母標音文獻、諺文標音文獻等。只有將中外著述者描述的各種語音現象全部羅列出來，提取一致特點，解釋差異原因，我們才能較為準確地勾勒出明清官話語音面貌，從而在文化互動中推進中國音韻學的發展。

其三，研究非漢語母語者所記錄的語音材料，應具備雙重研究視野：既深入瞭解漢語本身的音韻結構，也明晰記音者母語的語音系統。在此基礎上，當文獻中出現“語音偏誤”時，可以根據研究目的的不同進行差異化處理：如果旨在研究漢語語音史，則需根據對音規則審慎轉換出此時官話的實際音值；如果旨在研究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史，這些“偏誤”則可轉化為揭示早期漢語學習者語音感知、中介語系統與中西文化交流的寶貴證據。唯有將這批文獻放在更廣闊的學術視野和更綜合的學術思路裏，我們才能真正釐清它們的學術價值，從而讓我們的研究更具邏輯力量。

鳴謝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6–18 世紀多語種官話羅馬字注音文獻數據庫建設與語音研究”（25CYY022）的階段性成果。《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和匿名評審專家為本文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參考文獻

鮑懷翹。1984。普通話單元音的生理解釋。中國語文 2。117–127。Huaiqiao Bao. 1984. Putonghua danyuanyin de shengli jieshi. *Zhongguo Yuwen* 2. 117–127.

丁鋒。1995。琉漢對音與明代官話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Feng Ding. 1995. *Liu-Han Duiyin yu Mingdai Guanhuayin Yanjiu*.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董建交。2021。近代官話音韻演變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Jianjiao Dong. 2021. *Jindai Guanhua Yinyun Yanbian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段亞廣。2021。河南方言 ɥ 韻的分布與形成。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第 30 卷）。1–5。Yaguang Duan. 2021. Henan fangyan ɥ yun de fenbu yu xingcheng. *Zhongguo Yuyan Wenxue Yanjiu*, di 30 juan. 1–5.

蔣冀騁。2002。《西儒耳目資》中的“u 次”為舌尖前高元音說質疑。雲夢學刊 6。103–106。Jicheng Jiang. 2002. *Xiru Ermu Zi* zhong de “u ci” wei shejian qian gao yuanyin shuo zhiyi. *Yunmeng Xuekan* 6. 103–106.

金基石。2007。漢語 y 韻母與朝鮮文獻的對音。民族語文 1。56–60。Jishi Jin. 2007. Hanyu y yunmu yu Chaoxian wenxian de duiyin. *Minzu Yuwen* 1. 56–60.

柯蔚南。2003。英譯出版前言。見瓦羅，華語官話語法，姚小平、馬又清（譯），F6–F18。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W. South Coblin. 2003. Yingyi chuban qianyan. In Francisco Varo, *Huayu Guanhua Yufa* [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trans. by Xiaoping Yao & Youqing Ma, F6–F18. Beijing: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Chubanshe.

李得春。1990。介紹《洪武正韻譯訓》的韻母譯音。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80–88。Dechun Li. 1990. Jieshao *Hongwu Zhengyun Yixun* de yunmu yiyin. *Yanbi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2. 80–88.

李得春。1997。關於標記在朝鮮諺解書中的近代漢語舌尖元音。民族語文 3。51–60。Dechun Li. 1997. Guanyu biaoji zai Chaoxian yanjieshu zhong de jindai Hanyu shejian yuanyin. *Minzu Yuwen* 3. 51–60.

李新魁。1982。記表現山西方音的《西儒耳目資》。語文研究 1。126–129。Xinkui Li. 1982. Ji biaoxian Shanxi fangyin de *Xiru Ermu Zi*. *Yuwen Yanjiu* 1. 126–129.

利瑪竇。2014。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文錚（譯），梅歐金（校）。北京：商務印書館。Matteo Ricci. 2014. *Yesuhui yu Tianzhujiao Jinru Zhongguo Shi* [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 trans. by Zheng Wen, proofread by Eugenio Menego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林連通（主編）。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Liantong Lin et al. (eds.). 1993. *Quanzhoushi Fangyan Zhi*.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凌鋒。2011。蘇州話 [i] 元音的語音學分析。語言學論叢（第四十三輯）。177–193。Feng Ling. 2011. Suzhouhua [i] yuanyin de yuyinxue fenxi. *Yuyanxue Luncong*, disishisan ji. 177–193.

劉曉南。1999。宋代閩音考。長沙：嶽麓書社。Xiaonan Liu. 1999. *Songdai Minyin Kao*. Changsha: Yuelu Shushe.

劉曉南。2001。朱熹與閩方言。方言 1。17–33。Xiaonan Liu. 2001. Zhuxi yu Min fangyan. *Fangyan* 1. 17–33.

劉曉南。2023。朱熹語音及語音思想研究：以叶音為核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Xiaonan Liu. 2023. *Zhuxi Yuyin ji Yuyin Sixiang Yanjiu: Yi Xieyin wei Hexin*.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魯健驥。1984。中介語理論與外國人學習漢語的語音偏誤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 3。44–56。Jianji Lu. 1984. Zhongjieyu lilun yu waiguoren xuexi Hanyu de yuyin pianwu fenxi.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3. 44–56.

陸志韋。1947。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所記的音。燕京學報 33。115–128。Zhiwei Lu. 1947. Jinnige *Xiru Ermu Zi* suo ji de yin. *Yanjing Xuebao* 33. 115–128.

陸志韋。1988。釋《中原音韻》。見陸志韋近代漢語音韻論集，1–34。北京：商務印書館。Zhiwei Lu. 1988. Shi *Zhongyuan Yinyun*. In *Lu Zhiwei Jindai Hanyu Yinyun Lunji*, 1–34.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羅常培。1930。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3)。267–338。Changpei Luo. 1930. Yesuhuishi zai yinyunxue shang de gongxian.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1(3). 267–338.

麥耘。2004。漢語語音史上的 ï 韻母。見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編），音韻論叢，19–47。暨南：齊魯書社。Yun Mai. 2004. Hanyu yuyinshi shang de ï yunmu. In Zhongguo Yinyunxue Yanjiuhui & Shijiazhuang Shifan Zhuanke xuexiao (eds.), *Yinyun Luncong*, 19–47. Jinan: Qilu Shushe.

甯繼福。1985。中原音韻表稿。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Jifu Ning. 1985. *Zhongyuan Yinyun Biaogao*. Changchun: Jilin Wenshi Chubanshe.

阮廷賢。2012。漢越語音系與喃字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Dinh Hien Nguyen. 2012. *Han-Yue yu yinxi yu nanzi yanjiu*. Shanghai: Fud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邵榮芬。1995。吳棫《韻補》和宋代閩北建甌方音。中國語文 5。321–335。Rongfen Shao. 1995. Wu Yu *Yunbu* he Songdai Minbei Jian'ou fangyin. *Zhongguo Yuwen* 5. 321–335.

沈鍾偉。2022。舌尖元音的感知是央高元音——高本漢之前的音譯材料中的證據。中國語言學集刊 15。175–188。Zhongwei Shen. 2022. Shejian yuanyin de ganzhi shi yang gao yuanyin: Gaobenhan zhiqian de yinyi cailiao zhong de zhengju. *Zhongguo Yuyanxue Jikan* 15. 175–188.

宋欣橋。2019。國際音標（IPA）訓練教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Xinqiao Song. 2019. *Guoji Yinbiao (IPA) Xunlian Jiaocheng*.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孫伯君。2009。從契丹小字“咎”看支思韻在遼代的分佈。中國語文 1。75–77。Bojun Sun. 2009. Cong Qidan xiaozi “ 咎 ” kan Zhi-Si Yun zai Liaodai de fenbu. *Zhongguo Yuwen* 1. 75–77.

孫宜志。2014。也談《西儒耳目資》“甚”“次”“中”的含義。語言研究 2。90–94。Yizhi Sun. 2014. Ye tan *Xiru Ermu Zi* “shen”, “ci”, “zhong” de hanyi. *Yuyan Yanjiu* 2. 90–94.

唐作藩。1991。《中原音韻》的開合口。見高福生等（編），《中原音韻》新論，167–17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Zuofan Tang. 1991. *Zhongyuan Yinyun* de kaihekou. In Fusheng Gao et al. (eds.), *"Zhongyuan Yinyun" Xinlun*, 167–179.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瓦羅。2003。華語官話語法，姚小平、馬又清（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Francisco Varo. 2003. *Huayu Guanhua Yufa* [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trans. by Xiaoping Yao & Youqing Ma. Beijing: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Chubanshe.

萬獻初。2011。撮口呼形成、發展與應用的歷時進程。勵耘學刊（語言卷） 1。146–176。Xianchu Wan. 2011. Cuokouhu xingcheng, fazhan yu yingyong de lishi jincheng. *Liyun Xuekan*, yuyan juan 1. 146–176.

王弘治。2012。早期支思韻的音值及其演進。中國語言學報 40。421–441。Hongzhi Wang. 2012. Zaoqi Zhi-Si Yun de yinzhi ji qi yanjin. *Zhongguo Yuyan Xuebao* 40. 421–441.

王力。1991。漢越語研究。見王力文集（第十八卷），460–587。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Li Wang. 1991. Han-Yue Yu Yanjiu. In *Wang Li Wenji*, dishiba juan, 460–587. Jinan: 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

王力。2010。漢語語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Li Wang. 2010. *Hanyu Yuyin Sh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王松木。2011。《西儒耳目資》所反映的明末官話音系。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Songmu Wang. 2011. *"Xiru Ermu Zi" suo Fanying de Mingmo Guanhua Yinxi*. Taibei: Huamulan Wenhua Chubanshe.

威妥瑪。2002。語言自邇集：19 世紀中期的北京話，張衛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Thomas Francis Wade. 2002. *Yuyan Zi'er Ji: 19 Shiji Zhongqi de Beijinghua*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 trans. by Weidong Zhang.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玄貞姬。2018。對韓韻母教學難度序列及其教學策略。漢語學習 2。96–104。Zhenji Xuan. 2018. Dui Han yunmu jiaoxue nandu xulie ji qi jiaoxue celüe. *Hanyu Xuexi* 2. 96–104.

曾南逸。2015。《韻會》貲字母韻的性質和音值——以漢語方言、"域外方言"等材料為證。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539–543。Nanyi Zeng. 2015. *Yunhui* Zi Zimuyun de xingzhi he yinzhi: Yi Hanyu fangyan, "yuwai fangyan" deng cailiao wei zheng. *Tianji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6. 539–543.

曾曉渝。1995。《西儒耳目資》聲韻系統研究。見西南師範大學中文系漢語史研究室（編），漢語史論文集，11–49。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Xiaoyu Zeng. 1995. *Xiru Ermu Zi* shengyun xitong yanjiu. In Xinan Shifan Daxue Zhongwenxi Hanyushi Yanjiushi (ed.), *Hanyu Shi Lunwen Ji*, 11–49. Chongqing: Xi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

張民權。2005。宋代古音學與吳棫《詩補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Minquan Zhang. 2005. *Songdai Guyinxue yu Wu Yu "Shi Buyin"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張民權。2013。論宋代資思韻的語音性質及其嬗變。語言研究 1。68–76。Minquan Zhang. 2013. Lun Songdai Zi-Si Yun de yuyin xingzhi ji qi shanbian. *Yuyan Yanjiu* 1. 68–76.

趙日新。2007。漢語方言中的 [i]>[ɿ]。中國語文 1。46–54, 96。Rixin Zhao. 2007. Hanyu fangyan zhong de [i] > [ɿ]. *Zhongguo Yuwen* 1. 46–54, 96.

鄭張尚芳。1998。《蒙古字韻》所代表的音系及八思巴字一些轉寫問題。見《李新魁教授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李新魁教授紀念文集，164–181。北京：中華書局。Shangfang Zhengzhang. 1998. *Menggu Ziyun* suo daibiao de yinxi ji Basiba zi yixie zhuanxie wenti. In *Li Xinkui Jiaoshou Jinian Wenji* Bianji Weiyuanhui (ed.), *Li Xinkui Jiaoshou Jinian Wenji*, 164–181. Beijing: Zhonghua Shuju.

朱曉農。2004。漢語元音的高頂出位。中國語文 5。440–451, 480。Xiaonong Zhu. 2004. Hanyu yuanyin de gaoding chuwei. *Zhongguo Yuwen* 5. 440–451, 480.

A Study of the Tripartite *shen–zhong–ci* Division of the Letter *u* in *Xiru Ermu Zi*: With Remarks on the Complex Nature of Western Phonetic Transcriptional Materials on Mandari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u Yin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mplex nature of Western phonetic transcriptional materials on Mandari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s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in previous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letter *u* in *Xiru Ermu Zi*, this study conducts a detailed case analysis and proposes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s for the tripartite division of *u*: *shen u* [u], *zhong u̯* [ʉ], and *ci u̇* [ɯ/ɿ]. It argues that the perceptual distinctions among these divisions arise from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oral resonance cavitie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further clarifies the inherently complex nature of such Western phonetic records: while providing crucial phonetic evidence for reconstructing the Mandarin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y also exhibit transcriptional biases arising from foreign observers' auditory and linguistic frameworks, which assimilate Mandarin phonetic categories into their own pre-existing perceptual categories. These deviations, in turn,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and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Keywords

Xiru Ermu Zi phonology, *shen–zhong–ci* distinction, sound change, language contact

通訊地址：南京 棲霞區 南京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yinyu1113@foxmail.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10月22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5月5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5月18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6月30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0月30日